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及其与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的关系*

刘思含¹ 伍新春^{1,2} 王歆逸¹

(1.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理学院心理学系,珠海 519087)

摘要: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学习投入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对13个省市的37所中小学共计4884名青少年进行调查,运用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探索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并通过其对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的预测来验证潜在类别的效度。结果发现:(1)从青少年的角度,父母教养方式可分成疏离忽视型(6.6%)、漫不经心型(18.9%)、温暖接纳型(48.2%)、温暖控制型(11.9%)、严苛控制型(2.9%)、严父慈母型(4.0%)和严母慈父型(7.5%)七种潜在类别;(2)父母温暖接纳型和温暖控制型的青少年拥有最高的学习投入水平,但温暖控制型的焦虑症状水平显著高于温暖接纳型;(3)父母疏离忽视型的青少年拥有最低的学习投入水平和较低的焦虑症状水平,父母严苛控制型的青少年拥有最高的焦虑症状水平和较高的学习投入水平。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潜在剖面分析;学习投入;焦虑症状;青少年

分类号:G442

1 引言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时所呈现的态度、情感与行为模式的总和。它既包括与父母责任相关的、具体的目标行为,也包括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所展现的非言语信息,如手势、音调和情感表露(Darling & Steinberg, 1993)。一直以来,研究者倾向于采用类型化的视角探讨教养方式(Power, 2013)。早在20世纪70年代, Baumrind(1971)就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放任型和专制型,并指出不同类型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后续有许多研究丰富和发展了Baumrind的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Maccoby和Martin(1983)提出的观点。他们基于反应性(responsiveness)与要求性(demandingness)两个维度,将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高回应高要求)、专制型(低回应高要求)、溺爱型(高回应低要求)和忽视型(低回应低要求)四种类型。这一类型划分得到了研究领域的广泛认可,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分类方式之一。之后,国内学者蒋奖等人(2010)基于瑞士学者Perris等人(1980)的研究,将父母教养方式确定为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种类型。拒绝指父母敌意、严苛

与惩罚式的教养方式;情感温暖指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接纳与支持;过分保护指父母对孩子的过分干涉、严格管理与控制。

但是,不管是上述“一分为三”还是“两维四象限”的教养方式类型,实质上都是采用“一刀切”的分类标准。Mandara(2003)认为,仅仅依据某种分类标准划分教养方式,无法包括足够丰富的教养方式类型;仅仅依据父母在某一类教养方式的得分来确定父母的教养方式,可能存在过分夸大该教养方式类型的可能性。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一个多维构成的有机整体,父母在对孩子进行教养时,往往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方式,某一位父亲或母亲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教养方式,只是不同的教养方式占有不同的比例和水平。例如,一位母亲在大部分时间和情境下对待孩子都是温和、鼓励的,但偶尔也会采用体罚、控制等教养方式,呈现出一种多类型组合的教养方式。

近年来,不少实证研究尝试采用个体中心的方法,关注父母教养方式的实质类别而非某个特定类型。这一方法是依据样本的数据特点,综合考虑理论假设、模型拟合指数、信度指标等信息,对个体属于哪一群体做出估计,进而确定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Laursen & Hoff, 2006)。相较于传统的三分法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际和谐心理健康促进技术研究”(15ZDB139)。

通讯作者:伍新春, E-mail:xcwu@bnu.edu.cn

或是四分法,这种分析方法的结果更为可靠和有效(Mandara, 2003)。其中,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一种常见的个体中心的分析方法。此外, Smetana(2017)指出,研究者在探讨教养方式时,需要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具体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父母的权威和子女的服从,与西方的父母相比,中国的父母往往更为控制和专制,更少直接表达爱和情感(Zhang et al., 2017)。而个体中心的方法是基于样本的数据特点做出估计,能够更加有效地探索中国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有助于本土化研究的开展。

鉴于上述优势,目前已有三篇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青少年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Zhang 等人(2017)以小学生的母亲为研究对象,发现母亲的教养方式可划分为专制型、权威型、均衡型和严厉关爱型四种潜在类别。但是,该研究仅仅分析了母亲的教养方式,完全忽视了父亲的教养方式。事实上,仅仅着眼于母亲的教养方式是远远不够的,父亲在家庭中的职能同样重要(伍新春等, 2012)。吴鹏等人(2016)以高中学生为调查对象,基于父母在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种教养方式上的差异,将教养方式分成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三种潜在类别。但是,该研究直接将父亲和母亲视为同一整体,并未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教养方式。实际上,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并非完全相同(Martin et al., 2007)。此后,高嘉临(2020)选取高一学生为被试,分别对其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者都可以分为三种潜在类别: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其中,积极型教养方式在情感温暖维度上的得分较高,在拒绝和过度保护维度上得分较低;与之相反,消极型教养方式在拒绝和过度保护维度上得分较高,在情感温暖维度上的得分较低;混合型教养方式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均衡。但是,该研究也未同时分析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割裂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的完整性。

事实上,家庭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生态系统,父亲和母亲的教养行为是相互影响而非彼此独立的(Cox & Paley, 1997)。一方面,个体具有与自己的行为模式相似的人结成配偶的倾向性(Lyons et al., 2020),因此在教养孩子时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父母双方可能出于维持家庭功能完整的需要,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像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表现出非一致性(互补性)的教养方式(Dwairy, 2010)。Martin 等人(2007)认为,父

母其中一方的行为模式实际上会受到另一方以及双方共同作用的影响,这反映了将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发展适应的影响,可能在父母之间有所差异。例如,一项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母亲的情感温暖预测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父亲的情感温暖预测青少年的学业成就(Chen et al., 2000)。因此,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来同时研究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的不同组合,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及其对青少年发展适应的影响差异。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一致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发展适应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是孩子发展最重要的微观环境(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父母通过其教养方式与孩子产生互动,对孩子有着直接且不可替代的影响。对文献的系统回顾发现,父母的温暖、行为控制以及赋予青少年自主权,与青少年的内化症状呈负相关;相反地,父母的心理控制和过分严格的控制,与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自杀意念呈正相关(Gorostiaga et al., 2019)。但是,研究结果在东西方文化间存在差异。例如,在一项对亚裔和欧裔美国青少年学业表现的跨文化研究中,Chao(2001)发现,来自专制家庭的亚裔青少年在学业上的表现要优于来自权威家庭的青少年,而欧裔青少年则相反。而在国内相对有限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只是分别考察了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这三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与行为变量的关系(王亚丹等, 2020; 赵博艺, 2020),研究还缺乏全面性和整体性。因此,对于中国家庭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类别与青少年发展适应的关系,这一研究议题还有待探索。

研究者通常将青少年发展适应分为学业适应和非学业适应(Barger et al., 2019)。学业适应一般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非学业适应则包括社会适应、情绪适应(如焦虑和抑郁症状)和行为适应。本研究选取学习投入作为学业适应的指标,选取焦虑症状作为非学业适应的指标,通过探究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对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的预测作用来验证该潜在类别的信度。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来自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北京、天津、内蒙古)、华东地区(山东、安徽)、中

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西南地区(四川、贵州、广西)、西北地区(宁夏)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37所中小学,共计4884名青少年参与了调查。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0~19岁,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青少年年龄范围一致(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被试的平均年龄是 13.83 ± 2.41 , 51.6%的被试为女生, 50.4%的被试为独生子女。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养方式

采用蒋奖等人(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Egna Minnen Beträffande Uppfostran, s-EMBU-C)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测量。此问卷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两部分,每部分各21道题,均包括三个维度:拒绝(例如,“即使是很小的过错,爸爸/妈妈也惩罚我”)、情感温暖(例如,“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能感到爸爸/妈妈在尽量鼓励我,使我得到安慰”)和过度保护(例如,“爸爸/妈妈对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严格的限制而且绝不让步”)。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表示“从不”,4表示“总是”。该问卷广泛应用于中国青少年,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谢爱等, 2016)。在本研究中,教养方式量表父亲版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93、0.70,母亲版三个维度分别为0.88、0.94、0.75。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父亲版: $\chi^2/df = 26.66$, RMSEA = 0.07, CFI = 0.92, TLI = 0.90, SRMR = 0.09;母亲版: $\chi^2/df = 26.43$, RMSEA = 0.07, CFI = 0.90, TLI = 0.89, SRMR = 0.09。

2.2.2 学习投入

选用Schaufeli等人(2002)编制、方来坛等人(2008)修订的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UWES-S)测量青少年的学习投入水平。该量表共有17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活力(例如,“学习时,我精力充沛”)、奉献(例如,“我觉得学习很有价值和意义”)和专注(例如,“学习时我很专注,以至于忘了周围的一切”)。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从来没有”,“7”代表“总是”。在本研究中,学习投入量表总体和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和0.95、0.93、0.95。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chi^2/df = 74.80$, RMSEA = 0.12, CFI = 0.92, TLI = 0.90, SRMR = 0.03。

2.2.3 焦虑症状

采用Zung(1971)编制、汪向东等人(1999)修订

的焦虑自评量表中文版(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测量青少年的主观焦虑感受。例如:“我觉得比平常容易紧张和着急”。该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分成4级评定:没有或者很少时间(1)、小部分时间(2)、相当多时间(3)、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时间(4)。该量表总分介于20~80之间,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焦虑症状水平越高。该问卷广泛应用于中国青少年群体(刘贤臣等, 1997)。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对该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chi^2/df = 20.65$, RMSEA = 0.06, CFI = 0.93, TLI = 0.91, SRMR = 0.05。

2.3 研究程序

采用线上问卷填答的方式收集问卷信息。研究团队先联系参与学校,获得学校校长和各班班主任的支持。通过班主任将问卷星的链接发送给家长,再由青少年独立完成问卷。在问卷填答的第一页,向被试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承诺会对被试的所有有关信息进行保密,并附上研究团队的联系邮箱。本研究已获得所有被试家长的知情同意,且所有的被试均为自愿参与。

2.4 数据分析

使用Mplus 7.0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潜在剖面分析和回归混合模型(regression mixture model, RMM)。第一,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索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从初始模型开始,逐步增加模型中的类别数目,直至找到拟合数据最好的模型。模型拟合指数包括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ssaBIC(sample-size adjusted BIC)、Entropy、VLMR(vuong-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aLRT(adjusted 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和BLRT(boot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 test)。信息评价指标AIC、BIC和ssaBIC,统计数值越小表示拟合得越好(Marsh et al., 2009)。在进行模型比较时,VLMR、aLRT和BLRT用于比较 $k-1$ 个和 k 个类别模型间的拟合差异,如果 p 值显著,则说明 k 个类别模型优于 $k-1$ 个类别模型(Lo et al., 2001)。使用Entropy评价分类精确性,Entropy ≥ 0.80 表明分类准确率超过90%,是可接受的范围(Lubke & Muthén, 2007)。第二,在步骤一的基础上,采用BCH方法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变量预测结果变量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BCH是目前被广泛使用并被认为是各种变量类型中均表现稳健的一种方法(Bakk

& Vermunt, 2016)。这一步骤既验证了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分类,同时也探索了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剖面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

2.5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最大因子方差的解释率为 25.9%,低于 3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Malhotra et al., 2017)。

3 结果

3.1 描述性分析结果

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各个维度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见表 1。从相关分析结果可见,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在同一维度内,呈现出较高的相关。父亲和母亲的拒绝与自身和对方的情感温暖呈现显著负相关,父亲和母亲的拒绝与自身和对方的过度保护呈现显著正相关。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与自身的过度保护呈现显著正相关,母亲的情感温暖与父亲的过度保护呈现显著正相关,但父

亲的情感温暖与母亲的过度保护相关不显著。

3.2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为探究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本研究基于被试在父亲拒绝、母亲拒绝、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度保护的得分,建立潜在剖面分析模型。将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依次设为 1 到 10 类,一一进行模型比较。不同数目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数如表 2 所示。数据表明,各个信息指标显示的结论并不一致。首先,所有模型的 Entropy 值均超过了 0.8,表示所有模型的精确性良好。其中 Entropy 值最大的 5 类别,VLMR 和 aLMR 值不显著,说明 5 类别模型并不显著优于 4 类别。从 1 类到 10 类,AIC、BIC 和 ssaBIC 逐渐减少。从 8 类开始,VLMR 和 aLMR 值不再显著,说明 8 类及之后的模型并不显著优于 7 类别。综合各个指标和理论依据,我们认为 7 类别模型最能充分地描述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别信息,最终选择 7 类别模型为最佳模型。

表 1 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各个维度的相关和描述性统计

| | 1 | 2 | 3 | 4 | 5 | 6 |
|-----------|-----------|-----------|----------|----------|----------|------|
| 1. 父亲拒绝 | 1 | | | | | |
| 2. 母亲拒绝 | 0.64 *** | 1 | | | | |
| 3. 父亲情感温暖 | -0.37 *** | -0.27 *** | 1 | | | |
| 4. 母亲情感温暖 | -0.26 *** | -0.39 *** | 0.71 *** | 1 | | |
| 5. 父亲过度保护 | 0.57 *** | 0.37 *** | 0.14 *** | 0.12 *** | 1 | |
| 6. 母亲过度保护 | 0.43 *** | 0.60 *** | 0.02 | 0.06 *** | 0.61 *** | 1 |
| <i>M</i> | 1.53 | 1.55 | 2.83 | 3.07 | 1.99 | 2.13 |
| <i>SD</i> | 0.63 | 0.66 | 0.84 | 0.82 | 0.50 | 0.56 |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表 2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

| 模型 | 似然比 | 自由度 | AIC | BIC | ssaBIC | Entropy | VLMR(p) | aLMR(p) | BLRT(p) |
|----|-----------|-----|----------|----------|----------|---------|-------------|-------------|-------------|
| 1 | -29239.21 | 12 | 58502.43 | 58580.35 | 58542.22 | — | — | — | — |
| 2 | -26116.08 | 19 | 52270.17 | 52393.55 | 52333.17 | 0.865 | < 0.001 | < 0.001 | < 0.001 |
| 3 | -24506.29 | 26 | 49064.58 | 49233.41 | 49150.79 | 0.847 | < 0.001 | < 0.001 | < 0.001 |
| 4 | -23449.85 | 33 | 46965.70 | 47179.99 | 47075.13 | 0.879 | < 0.001 | < 0.001 | < 0.001 |
| 5 | -22948.90 | 40 | 45977.80 | 46237.55 | 46110.45 | 0.881 | 0.477 | 0.482 | < 0.001 |
| 6 | -22447.67 | 47 | 44989.34 | 45294.55 | 45145.20 | 0.863 | < 0.001 | < 0.001 | < 0.001 |
| 7 | -21876.08 | 54 | 43860.17 | 44210.83 | 44039.24 | 0.867 | 0.002 | 0.003 | < 0.001 |
| 8 | -21451.54 | 61 | 43025.08 | 43421.20 | 43227.37 | 0.847 | 0.446 | 0.452 | < 0.001 |
| 9 | -21067.90 | 68 | 42271.81 | 42713.38 | 42497.30 | 0.862 | 0.354 | 0.356 | < 0.001 |
| 10 | -20619.44 | 75 | 41388.88 | 41875.91 | 41637.59 | 0.873 | 0.183 | 0.187 |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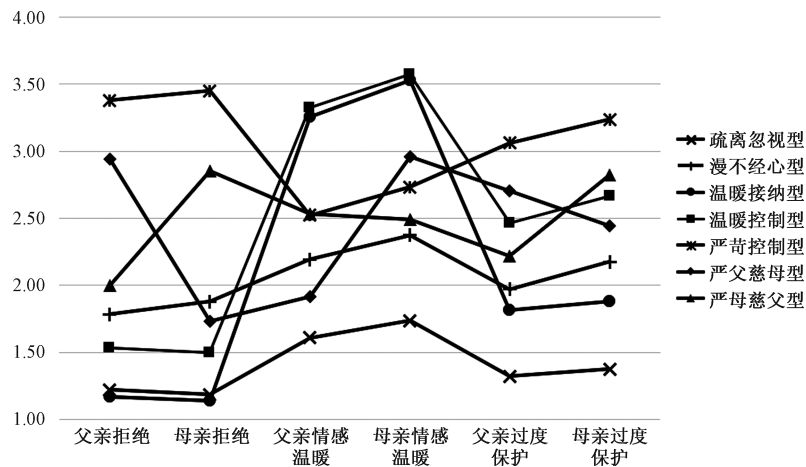


图1 父母教养方式的7个潜在类别

如图1可知,父母教养方式的7个潜在类别在6个维度上的均值差异明显,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中,类别1共有320人,占全体被试的6.6%;这组青少年评价的父母教养方式在所有维度得分都极低,命名为“疏离忽视型”。类别2共有923人,占18.9%;这组青少年评价的父母教养方式在所有维度得分都较低,命名为“漫不经心型”。类别3共有2354人,占48.2%;父亲和母亲均表现为极低的拒绝、极高的情感温暖和较低的过度保护,命名为“温暖接纳型”。类别4共有582人,占11.9%;父母和母亲均表现为较低的拒绝、极高的情感温暖和较高的过度保护,命名为“温暖控制型”。类别5共有142人,占2.9%;父亲和母亲均表现为极高的拒绝、中等的情感温暖和极高的过度保护,命名为“严苛

控制型”。类别6共有196人,占4.0%;父母间存在显著差异,父亲表现出较高的拒绝、较低的温暖和较高的过度保护,而母亲表现出较低的拒绝、较高的温暖和中等的过度保护,命名为“严父慈母型”。类别7共有367人,占7.5%;父母间存在显著差异,父亲表现出较低的拒绝、较高的温暖和较低的过度保护,而母亲表现出较高的拒绝、中等的温暖和较高的过度保护,命名为“严母慈父型”。

此外,本研究对上述7个潜在类别进行了事后分析,以验证这7个潜在类别在6个不同的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7个潜在类别在教养方式的6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3 父母教养方式的7个潜在类别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 | M(SD) | M(SD) | M(SD) | M(SD) | M(SD) | M(SD) | M(SD) | F |
| 父亲拒绝 | 1.22(0.33) | 1.78(0.37) | 1.17(0.23) | 1.53(0.37) | 3.38(0.46) | 2.94(0.51) | 2.00(0.53) | 2005.42*** 5>6>7>2>4>1>3 |
| 母亲拒绝 | 1.19(0.27) | 1.88(0.32) | 1.14(0.20) | 1.50(0.34) | 3.45(0.46) | 1.73(0.47) | 2.85(0.43) | 3272.80*** 5>7>2>6>4>1>3 |
| 父亲情感温暖 | 1.61(0.54) | 2.19(0.52) | 3.26(0.62) | 3.32(0.56) | 2.52(1.00) | 1.92(0.62) | 2.53(0.77) | 717.15*** 4>3>7, 5>2>6>1 |
| 母亲情感温暖 | 1.74(0.62) | 2.37(0.52) | 3.53(0.48) | 3.57(0.43) | 2.73(1.00) | 2.96(0.75) | 2.49(0.71) | 1004.68*** 4, 3>6>5>7>2>1 |
| 父亲过度保护 | 1.32(0.32) | 1.97(0.34) | 1.82(0.31) | 2.47(0.36) | 3.06(0.57) | 2.72(0.43) | 2.22(0.47) | 838.74*** 5>6>4>7>2>3>1 |
| 母亲过度保护 | 1.38(0.36) | 2.17(0.35) | 1.88(0.35) | 2.67(0.36) | 3.24(0.50) | 2.44(0.48) | 2.82(0.46) | 1043.09*** 5>7>4>6>2>3>1 |

注:1表示疏离忽视型,2表示漫不经心型,3表示温暖接纳型,4表示温暖控制型,5表示严苛控制型,6表示严父慈母型,7表示严母慈父型,下同。

3.3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在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上的特点

以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为结果变量分别

构建回归混合模型,结果发现父母教养方式的7个潜在类别在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上均存在显著差异($\chi^2 = 891.40, p < 0.001$)。结果如表4所示。就

青少年的学习投入水平而言,温暖接纳型($M = 5.45$)和温暖控制型($M = 5.41$)最高,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590$);接着是冷漠控制型($M = 4.95$);其次是严母慈父型($M = 4.51$)和严父慈母型($M = 4.39$),两者水平相当($p = 0.399$);再次是漫不经心型($M = 4.18$);最后是疏离忽视型($M = 3.95$),其学习投入水平最低。就青少年的

焦虑症状水平而言,冷漠控制型最高($M = 2.10$);接着是严父慈母型($M = 1.83$)和严母慈父型($M = 1.81$),两者水平相当($p = 0.78$);其次是漫不经心型($M = 1.73$)和疏离忽视型($M = 1.69$),两者差异不显著($p = 0.195$);再次是温暖控制型($M = 1.44$);最后是温暖接纳型($M = 1.34$),其焦虑症状水平最低。

表 4 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剖面在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上的特点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 变量 | $M(SE)$ | $M(SE)$ | $M(SE)$ | $M(SE)$ | $M(SE)$ | $M(SE)$ | $M(SE)$ |
| 学习投入 | 3.95(0.10) | 4.18(0.04) | 5.45(0.03) | 5.41(0.06) | 4.95(0.15) | 4.39(0.11) | 4.51(0.08) |
| 焦虑症状 | 1.69(0.03) | 1.73(0.02) | 1.34(0.01) | 1.44(0.02) | 2.10(0.06) | 1.83(0.04) | 1.81(0.03) |
| | 1 vs. 2 | 1 vs. 3 | 1 vs. 4 | 1 vs. 5 | 1 vs. 6 | 1 vs. 7 | 2 vs. 3 |
| | χ^2 | χ^2 | χ^2 | χ^2 | χ^2 | χ^2 | χ^2 |
| 学习投入 | 4.03 * | 187.32 *** | 144.55 *** | 29.83 *** | 8.84 ** | 18.39 *** | 611.15 *** |
| 焦虑症状 | 1.68 | 170.68 *** | 67.12 *** | 45.46 *** | 8.28 ** | 10.98 *** | 489.83 *** |
| | 2 vs. 4 | 2 vs. 5 | 2 vs. 6 | 2 vs. 7 | 3 vs. 4 | 3 vs. 5 | 3 vs. 6 |
| 学习投入 | 242.00 *** | 24.24 *** | 3.29 | 12.69 *** | 0.29 | 10.67 *** | 90.64 *** |
| 焦虑症状 | 136.34 *** | 41.54 *** | 4.90 * | 6.59 ** | 20.43 *** | 177.69 *** | 132.39 *** |
| | 3 vs. 7 | 4 vs. 5 | 4 vs. 6 | 4 vs. 7 | 5 vs. 6 | 5 vs. 7 | 6 vs. 7 |
| 学习投入 | 128.24 *** | 7.96 ** | 64.95 *** | 79.17 *** | 8.88 ** | 6.51 * | 0.71 |
| 焦虑症状 | 259.74 *** | 126.48 *** | 73.11 *** | 124.20 *** | 15.50 *** | 20.60 *** | 0.08 |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的七种潜在类别及其特点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疏离忽视型、漫不经心型、温暖接纳型、温暖控制型、严苛控制型、严父慈母型和严母慈父型等七种潜在类别。其中,温暖接纳型是人数最多的类别,接近一半(48.2%)的父亲和母亲均能给予孩子很高的情感支持与接纳,而很少表现出严苛惩罚和过度控制。相反地,严苛控制型是人数最少的类别(2.9%),这类父母经常采用惩罚、批评、严格限制、过分干涉等方式对待孩子。这两种类别的特点及其占比,与高嘉临(2020)、吴鹏(2015)等所定义的积极型和消极型相似。究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孩子进入青少年阶段,其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开始萌芽,许多父母能适应孩子的成长变化,展现出关爱与支持、给予更多的自由,较少采用惩戒、过分保护的教养方式。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中,温暖接纳型的人数最多,而严苛控制型的人数最少。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几个在前人研究中未发现的潜在类别,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补充。有

6.6%的父母属于疏离忽视型,这一类的父母既不严厉惩罚或严格控制孩子,也不予以孩子情感接纳和支持,几近于一种放任不管的状态。这种教养方式类似于 Maccoby 和 Martin(1983)提出的忽视型教养,对孩子既没有严格要求,也不进行情感回应。与这一类别相似的,还有 18.9%的父母属于漫不经心型。此类父母与疏离忽视型的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整体表现上趋于一致,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表现出比疏离忽视型父母稍多的严厉、干涉和接纳。漫不经心型的父母偶尔会对孩子发脾气、惩罚或是控制孩子,也偶尔会关心和鼓励孩子,但总体上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漫不经心型的父母在七类潜在类别中的占比,仅次于温暖接纳型,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教养方式。

与温暖接纳型相对应的,有 11.9%的父母属于温暖控制型。温暖控制型与温暖接纳型的不同在于,父母在与孩子进行互动亲近、关心鼓励的同时,也会干涉、控制孩子的选择,表现为过分担忧,甚至偶尔责骂孩子。此类父母的占比在七类中排名第三,是相对常见的一种教养方式。这一类别的大量存在,可能与中国的父母不太重视培养青少年的自

主能力(Supple et al., 2009),较少赋予青少年自由成长的空间,而往往采取“全包办”的做法有关。但实际上,这往往是一种“以爱之名”的控制。

在上述五个类别中,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总体趋近于一致,这符合选型婚配理论所认为的个体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行为方式相似的人结成配偶(Lyons et al., 2020)。但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并非总是一致,父母其中一方的行为模式实际上会受到另一方以及双方共同作用的影响(Martin et al., 2007)。因此,本研究还发现了严父慈母型和严母慈父型这两种教养方式的类别。在严父慈母的家庭中,父亲严厉、责骂、惩戒、不鼓励且严格限制孩子,而母亲接纳和支持孩子、偶尔限制孩子。相反,在严母慈父的家庭中,母亲严苛、惩罚、过分干涉和控制孩子,而父亲安慰和鼓励孩子、偶尔限制孩子。在这两类教养方式中,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其中,严父慈母型的占比(4.0%)低于严母慈父型(7.5%),这与传统观念认为的“严父慈母”在中国家庭中居多的印象(赵郝锐, 杨晓萍, 2018)有所不同。在传统观念中,父亲的形象通常是不苟言笑的,很少表扬孩子,给予孩子情感温暖的程度较低,教育方式十分严厉,普遍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材”。但在本研究中,此类父亲的占比并不高。

总之,本研究采用个体中心的方法,发现了父母教养方式的七种潜在类别,涵盖了在中国家庭中较为丰富的父母教养方式类型。一方面,从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上看,传统的“三分法”即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它们可能是一高一低,也可能同高同低,积极教养和消极教养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且并不少见。另一方面,从父亲和母亲两个主体来说,家庭系统中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可能是同质的,也可能是异质的,同时考察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组合非常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4.2 不同类别的父母教养方式在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上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父母教养方式在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七种潜在类别是有效的。七种类别的父母教养方式在青少年发展适应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支持了生态系统理论所认为的家庭这一微观环境对青少年发展适应至关重要的观点(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不同类别的父母

教养方式在青少年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上的特点。

第一,父母温暖接纳型的青少年表现出最高的学习投入和最低的焦虑症状,这说明这类青少年在学业适应与非学业适应上均表现最佳,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Zhang et al., 2017)。当父母双方均能在孩子需要情感支持时安慰、鼓励孩子,不会无故责备或限制孩子,那么青少年就更能专注地投入学习(Sun et al., 2020)。在学习时精力充沛、心情愉悦,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坚持不懈、积极应对。与此同时,情感接纳和温暖有助于青少年保持良好且稳定的心理状态(Butterfield et al., 2021),遇到情绪困扰能及时排解,因此焦虑症状水平也极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父母温暖控制型的青少年在学习投入的得分和温暖接纳型相当,但他们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焦虑症状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即使这一类的父母会予以孩子温暖关注,但同时也在过分干涉和限制孩子,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感和成长的空间。那么,到了青少年这个需要开始独立承担责任的年纪时,这些孩子更可能害怕犯错,对未来感到恐慌(Spada et al., 2012),进而出现一定水平的焦虑症状。不过,可能由于父母对孩子情感温暖水平很高的保护作用,使得较高水平的过度保护也没有对青少年带来严重的情绪困扰。

第二,父母疏离忽视型和漫不经心型的青少年拥有较低的焦虑症状水平,且他们的学习投入也极低。事实上,这两类的父母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参与和履行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Maccoby & Martin, 1983)。他们对孩子既没有严厉惩罚或严格限制,也没有情感温暖。父母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既没有促进青少年的学习投入,也没有导致其过高的焦虑症状水平。相反地,父母严苛控制型的青少年拥有极高的焦虑症状水平,同时也有较高的学习投入水平。这一类的父母重视规则和权力,他们常常监控孩子的行踪,并采用专制、敌意、惩罚式的方式,使孩子对其百依百顺(Baumrind, 1971)。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虽然对学习有较高程度的投入,但是也具有最高风险的焦虑症状水平。有研究认为,严苛控制型的教养方式会致使孩子产生非适应性的完美主义倾向(Soyas & Weiss, 2014),将父母对自己的严苛要求内化成自我要求,这种自我鞭策、自我批评的态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青少年投入学习,努力达成目标;但是,不切实际的目标、过分关注错误、过分害怕行动等,最终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焦虑症状(Smith et al., 2018)。

第三,在一个家庭系统中,父亲和母亲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教养方式(Dwairy, 2010)。不管是严父慈母型还是严母慈父型,青少年都拥有中等偏低的学习投入水平和中等偏高的焦虑症状水平,且二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学习投入上,这两种类型不如父母双方均“严”的严苛控制型高,这可能是因为当仅有一方父母表现为严厉惩罚和严格控制时,孩子会将另一方父母视为遇到困难时的温暖港湾,因此更难在学习上坚持不懈;也可能因为父母不一致的态度和规则,更可能使孩子摇摆不定。此外,父亲和母亲也可能会因为彼此不一致的教养方式而产生矛盾、冲突(Tavassolie et al., 2016),进而干扰到青少年的学习投入。而在焦虑症状上,这两类教养方式下成起来长的青少年没有严苛控制型的那么严重。这可能是因为其中一方父母提供的温暖港湾,使得青少年在遇到情绪困扰时得以获得部分缓解,从而不至于出现严重的焦虑症状。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中国青少年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了探索,并对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与青少年的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青少年的父母存在七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疏离忽视型(6.6%)、漫不经心型(18.9%)、温暖接纳型(48.2%)、温暖控制型(11.9%)、严苛控制型(2.9%)、严父慈母型(4.0%)和严母慈父型(7.5%)。

(2)父母温暖接纳型和温暖控制型的青少年拥有最高的学习投入水平,但温暖控制型的焦虑症状水平显著高于温暖接纳型。

(3)父母疏离忽视型的青少年拥有最低的学习投入水平和较低的焦虑症状水平,父母严苛控制型的青少年拥有最高的焦虑症状水平和较高的学习投入水平。

(4)严父慈母型和严母慈父型的青少年在学习投入和焦虑症状的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 Bakk, Z., Tekle, F. B., & Vermunt, J. K. (2013). Estimat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atent class membership and external variables using bias adjusted three-step approaches. In T. F. Liao & L. Savage (Ed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43, pp. 272-31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rger, M. M., Kim, E. M., Kuncel, N. R., & Pomerantz, E. M. (2019).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schooling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5(9), 855-890.
-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 1-103.
- Bronfenbrenner U., & Morris, P. A. (1998). The ecolog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In R. M. Lerner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5th ed., Vol. 1, pp. 993-1028). New York: Wiley.
- Butterfield, R. D., Silk, J. S., Lee, K. H., Siegle, G. S., Dahl, R. E., Forbes, E. E., ... Ladouceur, C. D. (2021). Parents still matter! Parental warmth predicts adolescent brain function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2 years late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3(1), 226-239.
- Chao, R. K. (2001). Extending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parenting style for Chinese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Child Development*, 72(6), 1832-1843.
- Chen, X., Liu, M., & Li, D. (2000). Parental warmth, control, and indulgence and their relations to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3), 401-419.
- Cox, M. J., & Paley, B. (1997). Families as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8(1), 243-267.
- Darling, N.,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3), 487-496.
- Dwairy, M. (2010). Parental inconsistency: A thir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parent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9(1), 23-29.
- Gorostiaga, A., Aliri, J., Balluerka, N., & Lameirinhas, J. (2019). Parenting styles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17), Article 3192.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6173192>
- Laursen, B., & Hoff, E. (2006). Person-centered and variable-centered approaches to longitudinal data.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2(3), 377-389.
- Lo, Y., Mendell, N., & Rubin, D. B. (2001). Testing the number of components in a normal mixture. *Biometrika*, 88(3), 767-778.
- Lubke, G., & Muthén, B. O. (2007). Performance of factor mixture models as a function of model size, covariate effects, and class-specific paramete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4(1), 26-47.
- Lyons, M., Brewer, G., & Carter, G. L. (2020). Dark Triad traits and preference for partner parenting sty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2, Article 10957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9.109578>
- Maccoby, E., & Martin, J.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 H. Mussen (Series Ed.) & E. M. Hetherington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4.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p. 1-101). New York: Wiley.
- Malhotra, N. K., Schaller, T. K., & Patil, A. (2017). Common method variance in advertising research: When to be concerned and how to control for it.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6(1), 193-212.

- Mandara, J. (2003). The typological approach in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s, and research.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6(2), 129–146.
- Marsh, H. W., Lüdtke, O., Trautwein, U., & Morin, A. J. S. (2009). Classical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academic self – concept dimensions: Synergy of person – and variable – centered approaches to theoretical models of self – concep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6(2), 191–225.
- Martin, A., Ryan, R. M., & Brooks – Gunn, J. (2007). The joint influence of mother and father parenting on child cognitive outcomes at age 5.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2(4), 423–439.
- Perris, C., Jacobsson, L., Linnström, H., Knorrning, L., & Perris, H. (1980). Development of a new inventory for assessing memories of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61(4), 265–274.
- Power, T. G. (2013).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styles: A brief histor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Childhood Obesity*, 9(Suppl. 1), 14–21.
- Schaufeli, W. B., Martinez, I. M., Pinto, A. M., Salanova, M. & Bakker A. B. (2002). Burnout and engagement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 cross – 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33(5), 464–481.
- Smetana, J. G. (2017). Current research on parenting styles, dimensions, and belief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5, 19–25.
- Smith, M. M., Vidovic, V., Sherry, S. B., Stewart, S. H., & Saklofske, D. H. (2018). Are perfectionism dimensions risk factors for anxiety symptoms? A meta – analysis of 11 longitudinal studies. *Anxiety, Stress, & Coping*, 31(1), 4–20.
- Soysa, C. K., & Weiss, A. (2014). Mediating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s – test anxiety relationships: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 77–85.
- Spada, M. M., Caselli, G., Manfredi, C., Rebecchi, D., Rovetto, F., Ruggiero, G. M., ... Sassaroli, S. (2012).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and metacognitions as predictors of worry and anxiety.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40(3), 287–296.
- Sun, Y., Liu, R. – D., Oei, T. – P., Zhen, R., Ding, Y., & Jiang, R. (2020). Perceived parental warmth and adolescents' math engagement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s of need satisfaction and math self – efficacy.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8, Article 101837. <https://doi.org/10.1016/j.lindif.2020.101837>
- Supple, A. J., Ghazarian, S. R., Peterson, G. W., & Bush, K. R. (2009). Assessing the cross – cultural validity of a parental autonomy granting measure: Compari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exico, and India.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40(5), 816–833.
- Tavassolie, T., Dudding, S., Madigan, A. L., Thorvardarson, E., & Winsler, A. (2016). Differences in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between mothers and fathers: Implications for child outcomes and marital conflict.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5(6), 2055–2068.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Adolescent health. Retrieved January 5, 2021, from http://www.who.int/maternal_child_adolescent/adolescence/en/
- Zhang, W., Wei, X., Ji, L., Chen, L., & Deater – Deckard, K. (2017). Reconsidering parenting in Chinese culture: Subtypes,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5), 1117–1136.
- Zung, W. W. K. (1971). A rating instru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 *Psychosomatics*, 12(6), 371–379.
- 方来坛, 时勘, 张风华. (2008). 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 16(6), 618–620.
- 高嘉临. (2020). 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手机依赖的关系: 基于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 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许燕. (2010).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26(1), 94–99.
- 刘贤臣, 孙良民, 唐茂芹, 刘连启, 杨杰, 马登岱, 赵贵芳. (1997). 2462 名青少年焦虑自评量表调查结果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1(2), 75–77.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卫生杂志社.
- 王亚丹, 孔繁昌, 赵改, 张星杰, 周博, 唐凤, 周宗奎. (2020). 父母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感恩: 心理特权和观点采择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4), 422–429.
- 吴鹏, 马桑妮, 方紫琼, 徐碧波, 刘华山. (2016). 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 潜在剖面分析. *心理与行为研究*, 14(4), 523–530.
- 伍新春, 郭素然, 刘畅, 陈玲玲, 郭幽圻. (2012). 社会变迁中父亲职能的凸显: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56–62.
- 谢爱, 蔡太生, 刘家僊. (2016). 父母教养方式对超重/肥胖青少年暴食行为的影响: 自尊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5), 837–840.
- 赵博艺. (2020). 高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对成就动机的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长春.
- 赵郝锐, 杨晓萍. (2018).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剖面分析.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71–176.

Latent Profile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LIU Sihan¹ WU Xinchun^{1,2} WANG Xinyi¹

(1.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t Zhuhai, Zhuhai 519087*)

Abstract: Based on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dentify the subtypes of Chinese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adolescent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anxiety symptoms. A total of 4884 adolescents ($M_{\text{age}} = 13.83$, $SD = 2.41$, 51.6% females) from 37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cross 13 provinc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completed Chinese version of Egna Minnen Beträffande Uppfostran (s-EMBU-C),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 (UWES-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nd determined seven subtypes of parenting styl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dolescents: neglecting (6.6%), average-level undifferentiated (18.9%), warm-caring (48.2%), warm-controlling (11.9%), strict-controlling (2.9%), strict-controlling father (4.0%), and strict-controlling mother (7.5%). Adolescents of warm-caring and warm-controlling parents exhibited the highest academic engagement, whereas the latter one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anxiety symptoms than the former ones. In addition, adolescents of neglecting parents had the lowest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relatively low-level anxiety symptoms. Furthermore, adolescents of strict-controlling parents had the highest anxiety symptoms and relatively high-level academic engagement.

Key words: parenting style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academic engagement; anxiety; adolescence